

珞珈中国哲学

关 洛 之 间

——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

文碧方 著

中华书局

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

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逐步确立。而在这一新的知识分类体系里，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里分离出来。由于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外来知识体系的新学科没有自己的历史及其固有的形态，在 20 世纪初期只能仿照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构造“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思想史的创作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代学人就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多次研讨争鸣，认真反省“中国哲学”学科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述了对中国哲学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实，在 20 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具体内涵，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诸先生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界定，如金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二者的不同，而他本人则倾向于用一种没有“成见”的态度写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而冯友兰先生本人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就明确地说，他是“就中国历史上各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明显地以西方哲学学科为标准来写一本“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张先生则辨析了“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可以包括印度系的哲学如佛教哲学，而他所

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主要是“中国系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大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谈论“中国哲学”问题，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思想史事实，那就是：20世纪的现代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谈“中国哲学”问题，就无法回避已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则是一个短期发展的结果，但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却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意义。中国文化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偏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也将走一条“综合创新”的道路；而如何“综合创新”，则将是言人人殊，各有胜途。

武汉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中部，是全国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哲学学院在全国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比较少有的学科齐全、学术传统深厚的哲学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其中，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國大陸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首肯与赞誉，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群体，是以萧蓬父、李德永、唐明邦、陈修斋、杨祖陶、刘纲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第一代开创者，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主张德业双修；以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对比为宏观研究构架，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契机与生命力为基本学术出发点，平章儒道墨释，涵化中印西马，认定明清之际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近代性的生长点，吸收并扬弃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有关明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思想成果，将中国文化“自万历到‘五四’的三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历史看作是一个同质的近代文化的运动过程”，从而论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性的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迈进的进程中，是少有的几个具有原生、内发现代文化形态的主要文明形态之一。在第一代学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之上，第二代、第三代学人，一方面深化前辈学者的许多固有的学术

问题,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学术发展情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佛教禅宗哲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一步地走进中国。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本哲学研究群体新的生长点。

本套丛书,主要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珞珈山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新进展的大致轮廓。丛书以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少量涉及中西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思想。这些内容反映了珞珈中国哲学第一代学人“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正在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慢慢地实现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谈“中国哲学”,可以分成“中国人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两大类。所谓“中国人的哲学”,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而“在中国的哲学”,则是指来自西方、印度等域外而在中国被传播、接受、研究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当然离不开“在中国的哲学”,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依据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思想资源,提出一整套哲学的解决方案或思想方案。这便是“中国人的哲学”的主要内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珞珈中国哲学,是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它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理想:居住于珞珈山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将努力依据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创造出一种“中国人的哲学”。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学术理想,目前的这套丛书与此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但可以看作是通向此目标与理想的一级台阶。

是为序。

吴根友

2008年2月4日

序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宋明理学所遭受的批判和否定可谓最为激烈,直到晚近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理学传统的价值与合理因素。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是儒释道三教长期碰撞、融合而重建的思想,呈现出了比汉唐时期更高更精致的精神形态与哲学义理,特别是它的宗教性、形上学、境界论与工夫论,以及对社会民间生活的指引。并且,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对东亚史与世界史带来深刻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陆宋代新儒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三十年里,学者们对宋代新儒学的一些领域作了十分深入的讨论,涌现了不少优秀成果,然而,通观这三十年来的宋代新儒学研究,虽成果众多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了大的突破,但仍有相当多的领域与方面需要发掘和拓展。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或通过对某一理学家或理学流派进行个案研究来还原其思想原貌;或致力于理学内部流派的分化与演变以及它们之间论辩与交流的清理;或从史学的角度来勾勒理学自身的发展和流衍等。这些研究似乎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宋代新儒学兴起时理学家的共同的问题意识以及两宋理学发展演变的义理主轴,也未能全面去揭示理学作为一极具生命力的有机体是如何对当时士人和社会的道德、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当然亦未能去深入探究理学传统作为一种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结合的伦理价值系统是如何重建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道德、精神与信仰生活的。

晚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堕落败坏无以维系,是非感与羞耻感俱丧,面对此道德的真空和伦理的隳败,在佛老的刺激下,北宋的知识人

特别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有一种道德意识的觉醒,有一种要对中国历史文化生命负责的使命感,张载宣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宋代理学家以先秦孔孟儒学所开创的精神传统为主要凭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释以及对佛老的借鉴、吸取,创造和确立了一套在尔后数百年里支配知识人精神生活的话语系统和思想范式。宋代理学家所开创的理学传统何以能影响近世中国达七八百年之久而形成一个“理学”时代?他们所确立的义理之旨何以能支配一代代知识人的精神生活?他们所奠定的理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来重建那个时代士人与社会的道德、精神与信仰生活?是如何来型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风骨?这无疑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中需探讨的重要课题。并且,如何将宋代理学传统置于我们今日的生活世界和全球化、现代化的视域中重新加以审视、清理与发掘,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今天道德精神生活中的重要资源与有机成分,这显然对当今国人道德、精神与信仰生活的重建亦是极富现实意义的课题。文碧方博士的《关洛之间——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一书正是对这一课题深入探讨后所取得的成果。

关学与洛学有何不同?关学何以衰落?关学何以“洛学化”?关学与洛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的难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般只是通过对张载自身思想与二程自身思想的各自考察和分析来进行研究的,文碧方博士“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对关学与洛学之间关系所作的探讨无疑颇具新意,因为吕大临先是张载关学中最为杰出的弟子,后为二程洛学中著名的“四先生”之一,是北宋理学中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人物。该书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透过其思想来重新把握和探讨张载、二程思想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与各自特色,力图对宋明理学研究中的这些难题作进一步的探明,因此,本书所作的研究与国内外学术界以往对关学、洛学的研究有所不同,既可以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亦可以深化对关学、洛学的研究。

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显然与佛老的刺激和挑战有关,为了回应佛老的挑战,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们力图通过对心性—形上学领域的探讨来

解决道德价值的根源、人之道德实践的根据等形上学与宗教问题,这是理学奠基者们共同的追求目标和主要的问题意识。本书在对理学奠基者们这一共同的追求目标和主要的问题意识有所把握的基础上,对张载、吕大临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探讨作了颇具深度的分析与讨论,因此,本书对儒学的宗教性、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的揭示和说明是具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与启迪性的,同时也可以对人们在宋明理学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与观点有所澄清与辨正。

理学家之所以为理学家,既在于他们创立和发展出了一套理学话语系统,也在于他们在道德、精神与信仰生活上的躬行践履、言行一致,故是否有此“践履工夫”是区别理学家与儒林文士的重要标准,也是理学家思想、人格与境界深具魅力和感召力之所在。文碧方博士在本书中不仅对理学奠基者张载、程颢、程颐的道德实践方法亦即工夫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而且对他们的人格与境界亦有所展示,因此,力图通过对理学奠基者们的实践、人格与境界的透视来彰显宋代理学的社会实践和宗教向度,也是本书的着力点之一。

现代宋明理学的研究,尽管其研究取径多元而又开放,但又无外乎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等途径。文碧方博士在本书中所采取的是注重哲学义理的辨析与诠释以及其发展脉络梳理的哲学史研究取径。在这一研究取径中,本书立足于吕大临、张载和二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直探关学与洛学的问题与义理,不仅对关学与洛学各自的问题指向、义理特色、内在脉络和意义世界作了尽可能客观而相应的了解和把握,而且对吕大临、张载、二程思想中的概念、命题、义理、思想的传接变化等作了细密的分析与严谨的逻辑推演,力图使吕大临、张载、二程那些零散的讲学语录、没有系统的文字呈现出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内在相连的系统性。众所周知,对张载、二程的问题、概念与思想作严密的剖析、系统性梳理与表述极为不易,作者对此所遇到的困难、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无疑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的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中国哲学的研究绝不是排他的,不需借

鉴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和其他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了。居今之世,中西交流互渗不仅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文碧方博士在本书中对吕大临、张载、二程的问题与思想进行分析和讨论时,自觉地以西方哲学、宗教学等有关理论资源作为参照、借鉴,因此,本书既彰显了宋代理学家思想的问题高度和义理深度,也拓展了宋代理学研究上的新的学术视野和新的问题意识。由此观之,比较开阔的中西学术视野与“中西互释”的方法,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色与可贵之处。

文碧方兄经历曲折,却一心向学,曾去北京大学学习,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师从冯达文教授,由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哲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可谓得南北学风的熏陶,而后定格于中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此从事研究并教书育人。碧方德业双修,宅心仁厚,基础扎实,学识广远,潜心书斋,不事张扬,服务公益,助人为乐,相信他在宋明理学与东亚哲学的研究上会有更多佳作问世。

是为序。

郭齐勇

辛卯年上元节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吕大临生平与著作	(1)
第二章 立“本”	(21)
第一节 “性与天道”	(21)
第二节 张、吕、康德与道德形而上学	(41)
第三节 “天理”与“时中”	(58)
第三章 成“性”	(75)
第一节 知以成性	(75)
第二节 礼以成性	(90)
第三节 知礼工夫之检讨	(107)
第四章 识“仁”	(122)
第一节 “反求吾心”	(122)
第二节 “识仁”之方	(141)
第三节 “体”与“用”	(167)
第五章 论“中”	(185)
第一节 “中”与“性”、“道”	(186)

第二节 “中”与“心”	(194)
第三节 “无勉无思”	(205)
第六章 思想影响及其定位	(215)
第一节 理心之间	(215)
第二节 吕大临与“五峰戴山系”	(230)
主要参考文献	(236)
后 记	(244)

第一章 吕大临生平与著作

陈寅恪先生曾认为：“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①诚然，宋明新儒学亦即理学作为中国思想历数千载的演进而出现于世的一大事因缘，不仅为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巅峰，而且整整影响近世中国达七八百年之久，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理学”时代。张载、程颢、程颐作为此新儒学的奠基人和这一“理学”时代的开创者，他们所确立的宗旨、所奠定的本体工夫论规模、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思想范式，在七八百年里被士人奉为圭臬，不仅成为了士人们的主流话语，而且支配着士人们的精神生活。后来理学的发展，宋元明诸儒者的推阐，无非更为精微和成熟而已，既不出张载、程颢、程颐所创之规模，亦未更换张载、程颢、程颐所立下的义理之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张载、二程所开创的话语系统何以能影响近世中国七八百年而形成一个“理学”时代？张载、二程所确立的义理之旨何以能支配一代代知识人的精神生活？张载、二程所奠定的理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来形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风骨的呢？毫无疑问，要探讨这些问题，这就需我们真正深入张载之关学与二程之洛学的内在讨论，去了解和把握张载、程颢、程颐的“问题意识”、“致思方式”、“立言宗旨”与“自我实践”；去了解和把握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的思想内核和特质；去了解和把握关学与洛学之间、大程与小程之间的同与异以及彼此间的关联；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

界一般是通过对张载思想与二程思想各自分别的考察和分析来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有鉴于此,本论著不愿重蹈其旧辙,故与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关学、洛学的研究不同的是: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以吕大临思想为透视的中心和焦点,透过其思想来重新探讨和把握张载思想、二程思想的内核和特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期深化和推进对关学、洛学的研究。

吕大临,字与叔,号芸阁,生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卒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其祖上是汲郡(今河南汲县)人,因其祖父太常博士吕通葬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遂为蓝田人。后人把吕大临与其兄吕大忠、吕大均合称为“蓝田三吕”,“蓝田三吕”是张载关学中的著名弟子,张载去世后,他们又问学于二程,在二程门下,吕大临与谢良佐、杨时、游酢并称为“四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上,因吕大临似乎并非理学大家,加之其寿不永,英年早逝,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认为其不足道也,例如:元脱脱在修《宋史》时,特立《道学传》,并将其置于《儒林传》之前,有宋一代道学主要人物周、张、程、邵、朱及其门人等几乎全都在册,却没有吕大临;近代以来,学术界一般视吕大临为二流或三流的理学家不值得研究,故也几乎没有专门探讨吕大临思想的著作。然而,作为张载关学弟子,吕大临不仅是张载关学弟子中的最为杰出者,而且还是张载关学弟子中唯一有著作传世者,通过吕大临这些传世的作品,则可以使人对张载著述中那些艰涩难懂令人见仁见智的文字有一恰当的把握;作为二程门人,吕大临不仅是程门举足轻重的“四先生”之一,而且他那些或撰或录于洛学阶段的《中庸解》、《东见录》、《识仁篇》、《论中书》、《克己铭》等则更不容轻忽,因为这些篇目既记录着“志于道者”的吕大临的所学、所思、所疑、所惑以及二程对他的“当机指点”,同时也记载着他躬身践履验之身心后的会心之得,故他的问题、他的困惑、他的省思与心得以及二程对他的指点在长达六百年的宋明理学时期一直备受理学家们的关注,发生在宋明时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争论几乎都摆脱不了与这些篇目的牵连。因此,吕大临实际上肩负着兼传张程关洛二学的使命,其思想在宋明理学史上有着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如果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透过其思想来重新把

握和探讨张载思想、二程思想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应不失为关学、洛学研究中的一条新的径路,也显然能推进和深化关学、洛学的研究。

吕大临父吕蕢,曾为比部郎中,教子六人,五子登科。吕大临兄弟中,今有史可考的有长兄吕大忠(进伯)、仲兄吕大防(微仲)、三兄吕大均(和叔),三人及第后皆任职为官,其仲兄吕大防曾位居丞相,为一代名臣。因吕大临以门荫入官,故人们一般认为他“不应举”,但其兄称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学之职者七年而逝”^①,其兄之说应更为可信。按“与叔年四十七”^②推算,吕大临在二十岁时即登进士第,四十岁时以父荫入官,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正因为他既登进士第,却以门荫入官,他人问其故,吕大临答道:“不敢掩祖宗之德。”^③

吕大临进士及第之后二十年没有任职为官,主要从张载和二程问学。吕大临师事张载的时间当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至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这一段时间张载辞官归居横渠故里,讲学关中,吕大临与其兄吕大均、吕大忠问学于张载,遂成为关学中的中坚人物。张载曾称赞道:“吕、范过人远矣,吕与叔资美。”^④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去世,吕大临时年三十一岁。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吕大临前往扶沟从二程问学,《程氏遗书》中“既重要而分量又最多”^⑤的卷二,就是这一年吕大临东见二程时所记录的二程之语。次年(1080年),吕大临又陪同程颐在关中讲学,程颐曾作《雍行录》以志之,吕大均、吕大忠也先后问学于二程。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程颐“以布衣被召”,任崇政殿说书。是年,吕大临也以门荫入官,为太学博士。因同在京城,故吕大临能常从程颐问学,程颐在《答吕进伯简三》中称:“与叔每过从,至慰至幸。”^⑥

① 《伊洛渊源录蓝田吕氏兄弟·祭文》,《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7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57页。

③ 《伊洛渊源录蓝田吕氏兄弟·遗事》,《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一,第620页。

④ 《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9页。

⑤ 牟宗三语。参见《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⑥ 《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5页。

宋哲宗元祐七年,“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可备劝学,未及用而卒”^①。其兄作《祭文》称:“子之学,博及群书,妙达义理,如不出诸口;子之行,以圣贤为法;其临政事,爱民利物,若无能者;子之文章,几及古人,薄而不为。”^②有人在挽诗中称他“曲礼三千目,躬行四十年”^③。苏轼也曾作《吕与叔学士挽词》云:“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论议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时叹,此涕无从何处倾。”^④

《宋史·吕大临传》称吕大临“通六经,尤邃于礼”^⑤,从吕大临的现存著述来看,确实如此。《伊洛渊源录》记载:“(吕大临)有《易》《诗》《礼》《中庸》说、《文集》等行世。”^⑥《朱子语类》称:“吕与叔《中庸》义,典实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⑦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载的吕大临的著作有《易章句》十卷、《礼记解》四卷、《编礼》三卷、《论语解》十卷、《考古图》十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⑧。朱彝尊的《经义考》记载吕大临曾有《书传》十三卷、《中庸解》一卷、《中庸后解》一卷、《孟子讲义》十四卷^⑨。这些记载表明吕大临对《易》、《诗》、《礼》、《春秋》等经典皆有解说,而在其整个著述中尤以有关礼方面的著作所占比重最大,除《礼记解》、《编礼》外,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的记载,尚有吕大临与其兄吕大防合撰的《吕氏家祭礼》一卷。现尚存的吕大临的主要著作,经陈俊民先生多年收集、整理,有《易章句》、《礼记解》、《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蓝田仪礼说》、《蓝田语要》等篇章。

吕大临先后从学于张载和二程,其为学固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

① 《宋史·吕大临传》卷三百四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49页。

② 《伊洛渊源录蓝田吕氏兄弟·祭文》,《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一,第617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第2561页。

④ 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三十三,《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4页。

⑤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一,第610页。

⑥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一,第617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第2561页。

⑧ 参见《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二,第628—630页。

⑨ 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9页。

性,但是由于他现存的作品大部分篇章所撰所录的年代不详,所以不能很好地将这阶段性呈现出来。换言之,如果不能弄清这些作品是撰或录于关学阶段,还是撰或录于洛学时期,那么,将无法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来揭示和探明张载之关学和二程(特别是大程)之洛学的思想内核和特质、关学与洛学的真实关系、关学的洛学化以及吕大临思想自身的发展过程和整体面貌。职是之故,要为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确立一个可靠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必须对吕大临现存主要作品的大致时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辨析和澄清。

《东见录》:即《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卷中已注明为“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虽然其中有二条注为“元丰五年永乐城事”,“此一段非元丰时事,疑后人记”,但主要为吕大临在元丰二年(1079年)所记的二程语录,此应无疑。

《论中书》:卢连章先生在《二程学谱》中认为,程颐、吕大临师生之间对“中”这一问题往复讨论的时间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①。但他未作具体说明,不知所据为何。陈俊民先生也把讨论时间确定为这一年。他可能是依据程颐《答吕进伯简三》来推断的,因为程颐在信中称“与叔每过从,至慰至幸”^②,故他们师生俩有往复数论“中”的机会,而程颐信中也表明吕大忠此时正知秦州,据《宋史·吕大忠传》可知吕大忠知秦州的时间为元祐初^③。从《论中书》本身内容来看,他们师生之间在讨论“中”的问题时,书信往来频繁,时间间隔短暂,如“大临前日敢指赤子之心为中者”,有时吕大临直接派人去听取意见,这些都表明两人相距不远,故陈俊民先生推断他们师生之间对“中”的问题的讨论发生在元祐初他们师生俩同居京师之时是可信从的。

《中庸解》:据朱彝尊的《经义考》记载:“吕氏大临《中庸解》一卷。存。”但又注明道:“疑即《二程全书》中所载本。”确实,在《二程全书》中收入有《中庸解》一卷,即《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八。尽管此《中庸解》未

① 参见卢连章:《二程学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② 参见《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附录三,第642页。

③ 《宋史·吕大忠传》卷三百四十,第10846页。

注明何人所著,但从被收入《二程全书》并作为《河南程氏经说》中的一卷这一点来看,此《中庸解》应为二程所作无疑。然而,《河南程氏经说》卷八的《中庸解》被认定为吕大临的作品又有什么坚明的证据呢?这就与朱子对此《中庸解》的考辨有关。清人吴廷栋在《重校二程全书凡例》中称:

《河南经说》凡《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皆伊川先生解经语也。《系辞解》及《诗、书解》、《论语解》,并非专门撰著,《春秋传》亦未成之书,《改定大学》兼载明道先生本以互证异同。明人刊《经说》,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然《经义考》引郑绍宗之言,谓《孟子解》乃后人纂集《遗书》、《外书》而成;《中庸解》出吕大临,朱子辨证甚晰。^①

朱子究竟是如何来辨明《中庸解》并非二程解经著作而是吕大临的作品的呢?

问:“《明道行状》谓未及著书,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书,亦疑《行状》所未尝载,后乃谓非明道不能为此。了翁之侄几叟,龟山之婿也。翁移书曰:‘近得一异书,吾侄不可不见。’几叟至,次日,翁冠带出此书。几叟心知其书非是,未敢言。翁问曰:‘何疑?’曰:‘以某闻之龟山,乃与叔初年本也。’翁始觉,遂不复出。近日陆子静力主以为真明道之书。某云:‘却不要与某争。某所闻甚的,自有源流,非强说也。’兼了翁所举知仁勇之类,却是道得著,至子静所举,没意味也。”^②

朱子在此说明道:《中庸解》为吕大临早年所著的情况,是杨时之婿几叟从杨时处所得知的。杨时与吕大临同为程门“四先生”,当然对此情况比较了解和熟悉,故朱子认为自己所知的情况是“自有源流,非强说也”。并且,朱子在其《中庸集解序》中还对此《中庸解》作过进一步的辨析和说明:

① 参见《二程集》,第1—2页。

② 《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第2494—2495页。